

中共第一名女党员的壮丽“春秋”



清朝末年，湖南长沙县清泰乡出了两个秀才，一位是枫树湾的廖芸可，一位是板仓冲的杨昌济。廖芸可的大女儿叫廖伯英，女婿叫何孟雄；杨昌济的小女儿叫杨开慧，女婿叫毛泽东。

何孟雄、廖伯英两人名字一“英”一“雄”，被誉为中共党史上著名的“英雄夫妻”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，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，他俩位列其中，廖伯英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。

头发的故事

1899年10月21日，廖芸可喜得千金，起学名廖伯英。廖伯英性格坚毅，天不怕地不怕。

1916年7月，廖伯英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，1919年7月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，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。

当时的北京，形成“中西学术争艳、古今百家齐鸣”的气象。新派女学生认为留长发是封建意识，廖伯英等女高师学生纷纷剪掉长发。女高师当局觉得她们挑战学校权威，贴出告示：“责令擅自剪发者复蓄，未剪发者不得效仿。如敢固违，定以校纪处罚，令家长接回不得再入本校。”还要求学生的保证人、监护人和家长督促执行。廖伯英、张挹兰、许羨苏和甘睿昌等4名女生死不遵命。廖芸可给校方回信支持女儿的行动。鲁迅是许羨苏的同乡、保人。鲁迅几次找女师校长疏通无果，就退了女师的聘书，还写了一篇《头发的故事》的短文加以讽刺。一片抗议声中，这件事不了了之。

偶然的的机会，廖伯英在北大湖南学生同乡会认识了北大学生、酃县同乡何孟雄。以后，她就常到北大旁听。

五四运动后，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。

邓中夏、何孟雄等13人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，宣布脱离家庭、婚姻和学校关系，暂时重工轻读，绝对实行共产。他们租了3间房

摆上5张桌，办了个“俭洁食堂”，切菜端盘子的几名学生都是日后中共党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。廖伯英等女生组织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，租房开起裁缝店、洗衣店，女学生变身“女裁缝”。

北京《晨报》第三版介绍了何孟雄等学生开办的“俭洁食堂”。廖伯英等人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，经过《晨报》的报道，甚至有外地女生前来参加。

学生们没有经营管理经验，赔了本钱。1920年3月23日，何孟雄的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解散；9月，廖伯英的女子工读互助团也解散了。

何孟雄、廖伯英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，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。

“亢慕义斋”与中老胡同5号

李大钊的大名，廖伯英早在湖南时就知晓。在北大听完先生的演讲，廖伯英找到李大钊“拜师”，李大钊答应了。从此，廖伯英经常到李大钊那里求教学习。

1920年3月，在李大钊倡导下，邓中夏、何孟雄、高君宇等19名北大学生，发起成立“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。经何孟雄介绍，廖伯英也加入研究会。北大校长蔡元培拨了两间房，一间做办公室，一间做图书室，名曰“亢慕义斋”(Communism音译)，即共产主义小室的意思，收集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及报刊杂志。何孟雄、廖伯英等常聚在这里潜心研读。

在李大钊的引导下，廖伯英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学生。1920年11月，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“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”，廖伯英参加了会议，她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。

1920年4月，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一行秘密来到北京，和李大钊、邓中夏、张国焘等召开座谈会后，建议建立共产党组织。之后，维金斯基一行秘密前往上海与陈独秀会面。8月，上海共产党成立，陈独秀当选为书记。在北京，李大钊、张申府、张国焘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。10月，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，李大钊、张国焘、罗章龙、刘仁静、黄凌霜、陈德荣、袁明熊、张伯根、陈友琴等9人，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。后来黄凌霜等4名无政府主义者宣布退出。为充实党组织力量，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吸收何孟雄、高君宇、邓中夏、廖伯英、范鸿劫、李梅羹等人转为党员，小组党员达到11人，并决定北京共产党小组命名为北京共产党支部，李大钊任书记。21岁的廖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。

景山东侧有几条细长的小胡同，老百姓形象地唤作老虎洞胡同。叫着叫着就简化了，西边的叫西老胡同，中间的叫中老胡同。

1921年10月9日，何孟雄、廖伯

英在中老胡同5号举行结婚典礼，他们家成了地下联络站。

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立，原北京共产党支部的《工人周刊》成为北方分部机关刊物，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廖伯英任编委成员。

1924年5月13日，湖北督军萧耀南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。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被捕后，供出在京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人的住址。5月21日清晨，京师警察厅侦缉队包围腊库胡同16号玄坛公寓。高君宇从窗口看见军警直奔张国焘的房间，赶紧销毁文件，化装走出大门。任中华铁路总工会干事的张国焘与妻子被抓后，出卖了党组织。中共北方区委安排李大钊离京到河北昌黎五峰山暂避，不久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“五大”。廖伯英由何孟雄护送，南下回到长沙。

“未能战死沙场，真是恨事！”

回到长沙后，受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邀请，廖伯英担任女师附小主事(校长)，在党内她兼任中共湘区区委委员和妇委书记，同时参与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，秘密联络机关就设在女师附小。

北伐军攻占武汉后，1926年10月，何孟雄调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，廖伯英也被党派到武汉，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，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主任蔡畅开展妇女工作。

1927年秋，受党组织派遣，廖伯英与丈夫秘密来到上海。何孟雄化名刘元和，表面是韩昌书店的店员，在党内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；廖伯英化名廖慕群，在华夏中学当物理老师，实际担任上海沪东区妇委会主任。

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上海一片白色恐怖。除了常搬家，廖伯英、何孟雄也作好牺牲的准备。廖伯英多次叮咛任秘密交通工作的廖位荣(廖伯英族兄)：“我们如果两晚没回来，你就搬家，以减少牺牲。”

为了开展秘密工作，廖伯英除了教书，还要到工厂做女工工作，时常天未亮出门夜深才归，回到家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女。1929年10月下旬，廖伯英染上伤寒，生命垂危之际与丈夫诀别：“既以身许党，应为党的事业牺牲，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，未能战死沙场，真是恨事！孟雄兄，你要坚决与敌斗争，直到胜利！”30岁的廖伯英走了。

廖伯英的灵柩暂厝上海扬州会馆。1931年2月7日，何孟雄在上海龙华监狱被国民党秘密枪杀。由于廖伯英遗体无人认领，扬州会馆迁址后，下落不明。两个孩子被关了一年多后被送进孤儿院，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，他们失散在战火中。

廖伯英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名女党员的壮丽“春秋”。

来源：北京日报

四川话“瓜娃子” 来源于《西游记》？

四川方言是方言宝库。当年投票选择普通话的基础语言，四川话仅仅差一票，就成了普通话。

目前的四川方言，不是古蜀人的方言。在明代之前，经过历代移民融合，四川本土方言逐渐形成。当时整个四川，讲话就跟现在的温江崇州口音一样。这种方言，语言学家称南路话。

明末，张献忠入川，连年战乱滥杀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空洞。清初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行动：“湖广(清时湖南湖北为湖广行省)填四川”，很多人从湖南湖北迁徙到四川。

湖广人覆盖了四川大部分地区，于是形成了另一种四川方言：湖广话。

作为四川省语言学会理事，黄尚军教授写了一篇文章，论述近百年来四川方言词汇的演变。

在这篇论文里，黄教授专门提到了四川方言里一些词语的来源，以及词语的变迁。

据黄尚军介绍，按照目前学术界的通行说法，全国有七大方言(有的说十大方言)，四川就占了四大方言：官话方言、湘方言、客家方言、闽方言。湘方言分布在金堂竹篙、达州一带，客家方言分布在龙泉洛带这些地方，闽方言还在寻找，但现在还没找到成型的。“有些地方把奶奶叫‘马马’，我们估计就是闽方言。”

所以四川方言很接地气、俗。黄尚军说，四川方言的特色就是融合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，只要适合，就能在这里生根，比如“瓜娃子”这个词，就是从西游记里来的。

2014年，在川师《巴蜀移民文化研究》的期末考试上，学生们就遇到了这个题：瓜娃子这个词是怎么来的？考到了很多学生。

据黄尚军考证，瓜娃子一词，来源于西游记。《西游记》十一回记载了唐太宗因魏征梦斩泾河老龙王，被其索命，魂游地府，后被放回，欲觅人到地府送瓜答谢。而均州人刘全，家有万贯财产。一日，其妻李氏在家门口拔金钗送给化缘的和尚。刘全回家得知后，骂她不遵妇道。李氏气不过，自缢而死。刘全因思念妻子，情愿以死到地府进瓜。

这个故事在四川广为流传，故四川人称“傻”为“刘”，把“傻瓜”称为“刘全进”。后来，慢慢有了“瓜娃子”一词。

不过也有很多专家认为：“瓜娃子”来源于《西游记》一说，论据并不充分。来源：华西都市报